



DAOIST STUDIES IN TRANSLATION SERIES

道教學譯叢(之十七)

A CATALOG OF DUNHUANG DAOIST SCRIPTURES

# 敦煌道經 目錄編(上)

[日] 大淵忍爾 著  
雋雪艷 趙蓉 譯

齊魯書社

道  
教



道教學譯叢(之十七)

# 敦煌道經 目錄編(上)

[日] 大淵忍爾 著  
雋雪艷 趙蓉 譯

齊魯書社

道  
教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道經 目錄編/[日]大淵忍爾著;雋雪艷,趙蓉譯. —濟南:齊魯書社, 2016. 10  
ISBN 978-7-5333-3483-3

I. ①敦… II. ①大… ②雋… ③趙… III. ①道教—宗教經典—圖書目錄—中國 IV. ①Z88:B9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186817 號

## 敦煌道經 目錄編

[日]大淵忍爾 著  
雋雪艷 趙蓉 譯

---

主管單位 山東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89 號  
郵 編 250002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ilupress@126.com  
營銷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東新華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開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張 34  
插 頁 5  
字 數 818 千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1—1000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3483-3  
定 價 128.00 圓

---

本書由香港青松觀資助出版



## 《道教學譯叢》編委會

名譽主編 黃健榮

名譽副主編 (以姓氏筆畫爲序)

周和來 林國柱 莫小賢 葉長清 趙淑儀

趙球大 鄭康勤 蕭炳強

主編 朱越利

副主編 王宗昱

編委 (以姓氏筆畫爲序)

丁焯 [日]山田俊(Yamada Takashi) 王卡

王宗昱 王承文 [法]呂敏(Marianne Bujard)

呂鵬志 朱越利 李剛 李之美 李遠國

李豐楙 [美]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

莊宏誼 [法]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

郭武 陳敏 陳霞 陳耀庭 孫亦平

黃海德 [日]麥谷邦夫(Mugitani Kunio)

[德]常志靜(Florian C. Reiter)

[韓]崔珍皙(최진석) 張思齊 張崇富 張廣保

萬毅 程樂松 [法]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

雋雪艷 [法]勞格文(John Lagerwey) 詹石窗

趙衛東 鄭素春 [日]橫手裕(Yokote Yutaka)

樊光春 黎志添 [美]劉迅(Liu, Xun) 劉仲宇

蕭登福 龔鵬程

本書責任編委 朱越利

學術秘書 宋學立 王皓月

## 總 序

16世紀，歐洲傳教士對中國感興趣，到中國收集資料，這些人被稱為“實踐型漢學家”，他們無意中發現了中國的道教，將之稱為“老君的宗派”或“道士的宗派”。大約到了19世紀，歐洲和亞洲有學者開始以學術的眼光關注道教。這些人多屬於“學院型漢學家”。大家一般認為法國和日本“學院型漢學家”的道教研究開始得最早，韓國、德國、英國、荷蘭、俄國等國也不晚。

20世紀以來，又有更多國家的學者加入道教研究的行列，為國際道教學注入了活力。道教學早就走向了世界，並且在相當長的時期裏由外國學者唱主角。

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學的動因不盡相同。有的出於對中國文化的仰慕或好奇，有的外籍華人學者是因為割不斷心中的祖國情結或文化認同，有的是出於學術、謀職的需要，或受到他人的指點或影響。不管怎麼說，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文化，中國人歡迎。他們的優秀成果，已成為世界道教學的寶貴財富。

這裏需要解釋一下。我所稱呼的道教學者，既包括專攻或主

攻道教學的學者，也包括僅僅兼攻道教學的學者。國外研究道教者，多為漢學家，專業分工比較寬。其中兼攻道教學的學者所占比例更大。

毋庸諱言，早期也有另一些外國道教學者，曾服務於他們國家對中國實施文化利用和文化占有的國家目的。這樣的意圖理所當然地遭到歷史的唾棄。還有些學者，信奉西方中心主義，或自認為是優等民族，高人一等。這些表現只能表明他們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具有歷史的局限性，令人遺憾。儘管懷着不光彩的動機，或妄自尊大，但上述兩種人中的許多人，由於是真正的學者，嚴格遵循學術規則，學風嚴謹，所以他們撰寫的一些道教學著作表現出純學術性，仍為學術作出了貢獻。他們中的一些學者，1978年以後到中國作學術訪問時，有人曾真誠地當面向中國學者表示深切的懺悔，有人已經克服了自身的歷史局限性，持平等、友好的態度。我親眼見到，特別讚賞。

一二百年來，一些國家的漢學界形成了道教學師承，學術薪火代代相傳。他們幾乎百分之百地懂漢文。有的人曾經客居官觀，體驗道士生活。有的人索性當一段時間的道士，學習科儀。他們不僅能夠熟練地運用西方近現代的研究方法，有人還精通中國傳統的文獻、訓詁、考據之學。有的人甚至親身實踐道教修煉。他們認識到道教對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作出“不瞭解道教就不瞭解中國”的結論。他們辛勤耕耘，碩果纍纍。許多經典之作，可以傳世。許多外國傑出的道教學者，舉世聞名。如今，國外一些研究所和大學，道教圖書的收藏規模令人歎為觀止。有的國家成立了道教學術團體，創辦了道教學雜誌，定期開展道教學術活動。國外的道教學早已形成相當的規模。

外國道教學者做了大量基礎性的和開拓性的研究工作。外國道教學者收集、考證、梳理道經，不遺餘力。他們跋山涉水，進行田野考察，記錄了大量珍貴資料。他們綜合分析各種文獻，追溯道教的歷史，儘可能使其面貌清晰。他們廣泛研究道教與社會各個方面的密切關係，創造了一系列術語。他們力求精確地解釋重要的概念，有時發生爭論。他們積累了寶貴的治學經驗，形成了自身的學術規範。我國學者從外國道教學成果中，獲益匪淺。外國道教學者是我們“厲害的競賽對手”，使我們時時不敢鬆懈。

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時，文化傳統的差異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比如，有時我們容易理解的事，外國學者却隔着一層窗戶紙。有時外國學者站在山外看廬山，會在我們司空見慣、不以為意之處大有發現。再比如，有的外國學者將道經的形成年代估計得較遲，有的外國學者斷言“道教沒有教義”。出現這些現象或結論的深層次原因，恐怕要從文化傳統的差異去尋找。外國學者進行跨文化的道教學研究，為我們提供了新思路 and 新的理論方法視角，提供了根本性的比較和真正的參照系，可以幫助我們的研究避免封閉和僵化。這對我們是極大的幫助。外國學者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場上研究“他人”，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誤解和誤讀，這客觀上對我們的研究起到提醒和啓發的作用。

1978年，道教學正式納入我國國家研究計劃。自那一年以來，我國道教學發展迅猛。現在是中外道教學者“攜手同臺唱大戲”。但學術研究無止境，我們不能滿足。我們今天進行道教學探究，不僅要高高地站在我國學術前輩的肩膀上，而且要高高地站在外國學術成果的高峰上。我們要經常對照參照系，還要對這個參照系進行研究。



當今我國研究道教的年輕學者，普遍精通一兩門外語，精通三門者就少了。精通四門或更多種外語的，很罕見。現在大家說到外國道教學，都能列出長長的學者名單和書目、篇目，但把各語種的主要成果都瀏覽過來的人幾乎沒有。這就需要翻譯。各國道教學的重要著作，翻譯到中國來的，還不多。大家分頭將各國飽含心血、充滿睿智的道教學著作翻譯出版，將是一件多麼大的好事啊！這些譯本可供我國道教學者參考自不必說，其他學科的學者也會從中受益，各官觀也將歡迎。本叢書就是做這件大好事的。

在中國，宗教學研究是冷門，道教學研究是冷門中的冷門。所以，研究道教“費力不討好”。道教學在外國也是冷門。近年來，略有些熱，終究還是冷的。外國大學攻讀道教學的學生，畢業後很難找到對口的工作，就是證明。一二百年來，外國道教學者坐冷板凳的也不少，也大都在寂寞中皓首窮經。人們常把教師比喻為“兩頭點燃的蠟燭”，歌頌他們“照亮了別人，燃盡了自己”。這些甘於寂寞的外國道教學者，默默地為人類積累知識，何嘗不是蠟燭！我們翻譯他們的著作，是對他們學術貢獻的認可，表達着我們的學術敬意。

1978年以來，中外道教學者的學術交流開始頻繁起來，相互結下深厚的學術友誼。歲月不饒人。25年來，前輩道教學者，大多已進入耄耋高齡，有的已經駕鶴西歸。許多外國道教學者，初識時還是滿頭青春秀髮，或烏黑發亮，或金色、褐色、紅色像火焰，像雲霞，現在都已經晨霜點點，甚至雪滿山巔了。每念及此，感慨萬分。但中外學者相互取長補短，切磋琢磨，其樂無窮，也使我們感到無限欣慰。我們同外國道教學者，當然是散多聚少。但學術交談是超越時空的。我更多的時間是在閱讀和書寫中同他們進行心靈交

談。我感到他們一直從我的書架上注視着我寫作，有時似乎就坐在對面賜教於我。我們中國道教學者，不僅擁有一批國內同行，還有不少國外高朋經常同我們進行學術對話，經常傳來友誼，我們怎能不感到精神上的富有？翻譯這些朋友們的著作將之出版，也是對他們的友誼的回報。這種回報純粹是學者式的。

朱越利

2003年8月24日

## 自序

筆者曾於二十餘年前出版了小著《敦煌道經目錄》，該目錄解說的內容是戰後東洋文庫新收藏的據斯坦因帶回英國的敦煌漢文文獻[見於翟林奈(L. Giles)氏整理、編纂的《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縮微膠片而復原的照片和先父於昭和初期帶回來的、由伯希和攜走的敦煌漢文文獻中道經部分的照片以及先父的筆記和作為主要內容的北京圖書館所藏敦煌道經照片，總共約有370件。

其中，關於斯坦因帶到英國的漢文文獻資料，我全部過目之後從中選出了道教經典，但是，後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藤枝晃博士指出了我漏掉的部分，並建議我對未知經名的文獻考訂其經名，然而，因雜事紛繁，終究未果。昭和四十四年(1969年)吉岡義豐博士又編輯了新的目錄，並由東洋文庫刊行出版，對我的舊目錄多有補遺，同時，對以前我一直未能確定的經名而加以勘定的事例也絕非止於一二。

幾乎與筆者發表舊著相同的時期，巴黎的吳其昱氏刊行了《太

玄真一本際經》，該書以圖錄形式公佈了以伯希和攜去的《本際經》為主體的、《本際經》十卷的主要內容。1962年，北京又出版了《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此書不僅包含了存於北京、倫敦、巴黎的漢文文獻，而且還包含了個人所藏敦煌遺書，目錄十分詳細，使檢索敦煌漢文文獻的工作方便了很多。另外，據說蘇聯亞洲民族研究所（現在的東洋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收藏了奧登保（Oldenburg）攜去的敦煌文獻數千件，記錄這些藏書情況的漢文文獻目錄二卷相繼刊行出版，我們可以據此瞭解其藏書全貌。關於大谷探險隊帶回的東西，除了戰前出版的圖錄之外，又新發現了文獻等其他資料；關於其中的文獻，龍谷大學出版了暫定目錄。還有，東德也存有相當數量的敦煌文獻，但是，還未進行充分的整理。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考慮應該修改舊著，又恰逢昭和四十二年我被指定為文部省在外研究員，得以歷訪巴黎、倫敦、列寧格勒等地，盡全力對敦煌文獻進行了考察，在倫敦的短暫期間內，還獲得了調查查理斯氏未整理本的難得機會，其後，臺北的“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文獻的調查結果被刊行出版，我因從昭和四十五年度開始的海外學術調查而有了訪臺的機會，並得以對臺灣的敦煌文獻進行了考察。這樣，我已經對於散見於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獻中與道教相關的鈔本——至少對其主要部分有了整體的瞭解和考察，於是，對於舊著加以改訂的想法就愈加強烈了。這時，我收到了伯希和所攜走的漢文文獻目錄的第一卷。

在我的舊著中，道藏與鈔本之間的對較只限於主要部分，鈔本之間的相互校勘完全沒有進行，這對使用者來說考慮得很不周到，因而，本書將所收錄的全部鈔本均與《道藏》進行了校對，而且，鈔本之間也進行了校對。這些校對均以鈔本為底本，因為我認為這

樣是最為合理的，那麼，另外再編輯一本圖錄篇將這些作為底本而使用的鈔本彙集起來也就變得很有必要了。

不過，當實際上將處於漢字變動時期的鈔本與相隔七八百年之後的刻本進行對比較勘的時候，所遇到的問題是極為繁雜的，其中有些問題又未必有多大的學術意義，因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給予省略。儘管如此，為了這種十分枯燥的工作，我最近兩三年所花費的勞力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想，犧牲了其他一切事情，將所有能夠使用的時間都投入到這項工作中，纔終於得以完成。

我從設想刊行本書至今已十餘年，今年正值我從岡山大學退職，這時出版這本書也包含着對自己退職的紀念。同時，對於國家所給予我的恩惠，自己完成了基本應盡的義務，使我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回顧過去的辛苦，也覺得肩上的重任可以卸下一半了，又感到輕鬆了許多。只是，對於自己花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歷經曲折而終於完成的這本書，在我編輯之中就常常在腦海中閃現出疑惑，不知它實際上究竟是否值得自己付出如此多的時間和精力。即便在本書已經完成的現今，心中仍有未能釋然者。關於本書的內容，特別是在校對方面，儘管作為著者我可以說自己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既有加以省略的部分，亦無自信斷言絕無脫落。因而，我希望特別對道藏本與鈔本之間校對的嚴密性有所要求的人們能夠對於我預定刊行的圖錄篇不惜勞苦而繼續進行校勘。

本書最終能夠得以編成，不僅受到上述諸目錄的恩惠，而且，繼之前的舊著，藤枝晃博士又給予我不可估測的許多有益的幫助。在資料搜集方面，巴黎國立圖書館東洋古文書部前部長、已故的吉尼爾女士以及現任部長塞吉女士、倫敦大英圖書館東洋部部長加德納氏、蘇聯東洋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主任研究員緬什克夫氏

以及東洋文庫的熱心幫助。在本書出版之際，獲得了大阪市立大學的本田濟教授的真誠幫助，順正女子短大助教授山口榮氏的幫助，在謄寫、校正草稿的過程中，拙妻給予我莫大的幫助，本書之所以能按預訂出版時間交稿，完全依賴上述各位的鼎力相助。另外，由於承蒙福武書店同意出版這本並非大眾性書籍，且難度很高的著作，尤其是首當其衝的學術科長田村幸久氏對我提出的各種難題均一一解決，纔使得本書最終順利面世。承擔本書印刷工作的牟禮印刷對我每次校對稿的遲遲提出和大量的難字以及在五校時還用紅筆進行修改等問題均表示了十分寬厚的態度，不遺餘力地給予我幫助。本書的題簽沿用了小島祐馬博士為我的舊著所寫題簽的部分文字。

無論學術價值如何，總之，此書能夠得以此種形式面世，全靠上述諸位以及其他未曾列出芳名的諸位朋友以各種形式給予我的幫助，茲一併致以深切的謝意！

本書在出版之際，獲得了文部省研究成果刊行費的補助，一併附記於此。

1978年3月28日著者識於尾道郊外美鄉草堂

## 總 說

收藏於此目錄的敦煌文獻資料共有 496 件，暫且將其分爲六類。不過，本書的分類並未採用作爲道教研究根本資料的道藏之自古以來的分類法即三洞四輔的分類條目。三洞四輔的分類法可以追溯到唐以前，但是，即便是在有相當數量的文獻遺留下來的唐代，據此分類的具體內容也並不清楚。並且，應是依據同一分類法而分類的現有的《道藏》即明代正統本《道藏》的目錄與作爲附錄載於《道藏》卷末的《上清經》（洞真部）及《靈寶經》（洞玄部）的古目錄之間有着顯著的差異（當然古目錄之間彼此也存在少許差異），可以說道藏目錄基本沒有保留舊的分類形態。例如《正統道藏》卷第一雖然是洞真部本文類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但正如其名所示，很久以來，它祇是《靈寶經》（洞玄部）之一，《道藏》的是六十一卷本，舊版的《度人經》是一卷本。關於古道經分類的具體內容我們有必要進行專門的論述，在當初，至少對基本部分應該是做了系統的分類。在這一點上，道經和佛經的情況不同，道經的絕大部分是後漢末以後，特別是東晉、南北朝以後編纂的。在編纂之際

對其進行分類時，雖然確實受到了佛教的影響，但是，另一方面，教派的因素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成爲其分類的基準之一（參照拙著《道教史研究》第三篇第一章）。後來，各教派經歷了興衰及相互間複雜關係的發展、變化，並且，由於新的教派的產生，以及隨着這些變化又不斷有新的經典被編寫出來、原有的經典發生佚失，因而，舊經典的所屬關係漸漸變得模糊起來，舊的經目實質上未能徹底發揮其《道藏》分類的作用。但是，因爲唯有三洞四輔的名目一直被保存下來，所以，產生了現存《道藏》目錄與古目錄之間明顯的不協調狀況。這其間的具體情況姑且不論，但是，毋庸置疑，依據現存《道藏》的分類來整理古道經其意義幾近於無。因爲舊時所說的三洞四輔的具體內容並不清楚，即便想要完全依照現存道藏的分類去做，實際上也是十分困難的。並且，我們在這裏提到的道經是在中國西北邊陲一個被認爲具有佛教商業都市之特殊形態的敦煌這個地方的石窟寺裏發現的，它夾雜在佛經當中偶然殘存下來。雖然可以預想其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偶然性和特殊性，但是在現實中可以看到道經，從我們能夠得知其名的古道教的整體來看祇是極有限且相當偏頗的部分。因此，本書不得不以一種較爲方便可行的分類法或者說是分類基準而進行分類。以下部分，則是關於分類的具體說明，並且，打算再談談敦煌道教的特徵。

## 一、靈寶經類

這裏所說的靈寶經類，第一，是指在古道經目錄裏被列入《靈寶經》的道經；第二，即便是沒有出現在目錄中，在經題中有洞玄靈寶或靈寶之詞語的道經，以及從舊道經（包含現存《道藏》中已收錄的部分）的引文乃至經文的內容來看，被判定爲靈寶經類的道經；



第三，在現存的《道藏》乃至《道藏》中的《闕經目錄》中，被冠以洞玄靈寶或洞玄、靈寶之名的道經。也就是說，依據原來的三洞四輔的分類應屬於洞玄部的內容。但是，在第三類中，有些道經是否從一開始就被視為《靈寶經》是值得懷疑的。第四，如《昇玄內教經》，雖然被清楚地冠以太上靈寶之名稱，但實質却是從《靈寶經》分出來的、或是獨立出來的經典（例如在《三洞奉道科誠儀範》卷第五 P 二三三七的法次儀品中，《靈寶經》就被另外冠以受經目和其稱號），這類相當於第二條分類的經典也包含在內。

《太玄真一本際經》至少作為敦煌道經其數量可謂出眾，足夠單獨建立一個條目，但是，却難以稱之為一“類”。並且，雖然它在表面上看起來與《靈寶經》無關，但實際上它是從《昇玄內教經》分出來的，因此，可以稱得上是與《靈寶經》同一源流的經典，為方便起見，亦將其附載於此（對於《昇玄內教經》和《本際經》之間的關係有必要另外加以論述，在此省略）。

## 二、上清經類

上清經類的分類基準和《靈寶經》的情況相同。根據三洞四輔的分類，上清經類屬於洞真部。從數量上看，上清經類沒有多到足夠建立一個條目的程度，但是，為了對古時的傳統分類表示敬意，並考慮到便於體現敦煌道經乃至隋和唐代前期道教的特徵，本書為上清經類單獨立一條目，將其與《靈寶經》並列。

## 三、道德經類

根據舊式分類，應立太玄部，其中包括道德經類（但是，在現在的《道藏》中，《道德經》及其注疏類與所謂的道家書籍一同被編入